

试论历史上儒家的反动路线 是怎样阻碍科学技术发展的

兰州化学工业公司三结合写作小组

我们中国在历史上是世界最文明的国家之一,在科学技术上有许多光辉成就。“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有了指南针的发明。还在一千八百多年前,已经发明了造纸法。在一千三百年前,已经发明了刻版印刷。在八百年前,更发明了活字印刷。火药的应用,也在欧洲人之前。”这些成就是我国劳动人民长期斗争实践的产物,是他们的智慧、才能和创造性的结晶。

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同社会制度、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密切相关的。在我国历史上,法家革新、进步的政治路线和唯物论的自然观,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而儒家守旧、倒退的政治路线和唯心论的“天命观”、“先验论”,则是束缚科学技术发展的桎梏。在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阐明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科学技术上的伟大贡献,深入揭露和批判阻碍科学技术发展的儒家反动路线,肃清其流毒,对于促使我国科学技术事业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更快地向前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恩格斯说:“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科学技术的进步、新的生产工具的运用、生产力的发展,是对旧的生产关系和旧的政治制度的猛烈冲击,必然引起反动统治阶级的恐惧、仇视和反对。

儒家反动派是怎样竭力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扼杀科学技术成果的呢?

一、推行唯心主义的思想路线,反对人们 正确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孔老二大肆鼓吹“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人们只能“听天由命”,接受“上天”的安排,而不能去认识自然,更不能搞什么改革。否则,“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董仲舒之流提出“天人感应”更反动的学说,把儒家思想和宗教迷信结合起来,附会人事。东汉时期,谶纬之学风行一时,不仅用来作为维护反动统治的工具,而且也成了儒家反对科学技术进步的武器,儒家将自然现象解释为上天意志的表示,给自然现象披上了神秘的外衣。东汉时,改《三统历》为较进步的《四分历》时就受到儒家顽固派贾逵、梁丰之流的反对,他们胡说什么《四分历》不符合谶纬之学,主张恢复《三统历》。这时著名科学家张衡就挺身而出,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用科学的道理,痛斥贾、梁之流的谬论,维护了《四分历》。后来,张衡又写了一篇《请禁绝图谶疏》,揭露谶纬之学是“欺世罔俗,以昧势位”的骗人之说,坚决主张“收藏图谶,一禁绝之”。他还认真研究天文、地震等自然现象,

并制作了浑天仪、地动仪等重要仪器。但是张衡的研究工作得不到统治者的重视,地动仪很快失传,浑天仪的原件也丢失了。

公元四六二年,南北朝时的进步科学家祖冲之,经过长期的精密观测和仔细推算,编写出比较准确的《大明历》。这个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新历法,也遭到儒家的竭力反对。腐儒权臣戴法兴叫嚷天文历法“非凡夫所测”,责骂祖冲之是“诬天背经”,硬说旧历法是“古人制章”,“万世不易”。祖冲之以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与戴法兴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说:日月五星的运行,“非出神怪,有形可检,有数可推”。只要进行精密的观测和细心的研究,就可以准确地掌握大自然的规律。他痛斥了那些“讖记碎言”。把戴法兴驳得理屈辞穷。

从“天命观”出发,儒家还拚命兜售唯心论的“先验论”。孔丘的“生而知之”、董仲舒的“圣人发天意”、朱熹的“即物穷理”、王守仁的“致良知”,都是这一类货色。在他们看来,知识和才能不是实践中产生的,而是“天”所赋予的,是头脑里固有的。

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决定了儒家极端鄙视生产劳动、科学实践。孔老二大骂要求学习农业生产技术的学生樊迟是“小人”。他们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寄生生活,却污蔑从事生产劳动、科学技术是“贱工末技”、“玩物丧志”。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被引向脱离实际、闭门读经的死胡同。特别是明、清以后,儒家大造“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十年寒窗,一举成名”的舆论,采取以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知识分子热衷于读经解经、钻营官禄而不肯参加生产实践、用心于科学技术的现象愈来愈严重。《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曾无限感慨地说:他那本记述工农业生产技术的书,是“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只会被文人学士“弃掷案头”。清代进步思想家顾炎武也愤愤地说:“开科取士,则天下之人,日愚一日”。

儒家唯心主义认识论思想还影响了科学家的科学研究工作。唐代天文学家张遂(一行),曾编制了当时较好的《大衍历》。但他却花了很大力气去寻求《大衍历》与儒家经典《易经》在数据上的某种联系,致使自己的科学研究工作带上了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根据他的推算而应发生的两次日食却没有看到。张遂却解释说,这是由于皇帝的德行感动了上天,上天就取消了这两次日食。其实,这两次日食确实是有的,只是中原一带看不到而已。“**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自然辩证法》)正是儒家的唯心论使他的才能得不到更大的发挥。在历史上,象这样的事例并不少见。

儒家反动派还用唯心论的“天才论”解释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把本来是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归之于帝王将相、圣人贤者的名下,根本抹煞人民群众在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的伟大贡献。《周礼·考工记·序》就鼓吹:“智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铄金以为刃,凝土以为器,作车以行陆,作舟以行水,此皆圣人之所作也。”在这种反动理论的影响下,就出现了所谓“蚩尤作冶”、“昆吾作陶”、“仪狄制酒”等说。流传颇广的所谓“蔡伦发明造纸术”也是一个典型的事例。事实证明,早在蔡伦前一个多世纪,西汉已有用麻造的纸。更早一些,还有用废丝造的絮纸,人们所说的“蔡侯纸”,不过是蔡伦主管的“尚方”(皇帝的御用作坊)中的工匠、农民、刑徒们用麻头、旧布、废鱼网造出的一种较好的纸。蔡伦只是一个监制者、推广者罢了。儒家炮制“英雄创造历史”的谬论,不仅埋没了广大劳动群众的发明创造,而且压抑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才能。如上所述,儒家

一方面把科学技术说成是“贱工末技”，极力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宣扬“天才论”，把科学技术说成是“高不可攀”、“神秘莫测”，只有圣人才能干的事情，使人们望而生畏，不敢沾边，极力维护他们对科学技术的垄断。

二、采取保守的经济政策，破坏生产，束缚科学技术的发展

恩格斯指出：“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自然辩证法》）在奴隶制崩溃、封建制兴起的时代大变革时期，儒家竭力维护腐朽的奴隶制生产关系。封建制确立和巩固后，他们采取了反对耕战、加重赋税、土地兼并等一系列保守的经济政策，反对法家发展经济的一切革新措施。到了封建社会后期，他们又拚命扼杀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儒家的倒行逆施，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西汉初期实行“盐铁官营”政策。由于人力、物力、财力的相对集中，进一步推动了冶铁业的发展，使青铜兵器逐步为锋利的钢制铁制兵器所代替，铁犁等新农具的使用也更普遍了。以大司马霍光为首的儒家们却疯狂地反对盐铁官营，他们鼓吹“奉天而法古”，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策划“盐铁会议”，对坚持盐铁官营的桑弘羊，实行突然袭击。桑弘羊年高七十，威风不减，他正义陈词，舌战群儒，挫败了他们的阴谋，保卫了“盐铁官营”政策。反动儒家们贼心不死，第二年，竟然采取卑鄙的手段，以“谋反”罪名，杀害了杰出的法家桑弘羊。

北宋中期，王安石实行变法。他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农业发展、有利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政策。如“农田水利法”、“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等。他还主张改革科举考试制度，使士人不困于“无补之学”，并在太学中增设武学、律学、医学等实用科学。以司马光为头子的儒家顽固派大肆攻击王安石的变法是“用贱凌贵，以邪妨正”（《续资治通鉴长编》）。宋神宗死后，司马光等守旧派掌了权，立即把王安石的新法全部废除。再一次暴露了儒家坚持保守、坚持复辟倒退的丑恶面目。

到封建社会末期，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曾国藩、李鸿章之流，胡说什么与洋人相比，“中国万不能及”，鼓吹“中不如西，学西可也”的洋奴哲学。他们大搞投降卖国的“洋务运动”，让洋人把持我国经济命脉，垄断我国科学技术，使我国科学技术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尊孔必崇洋，尊孔必卖国。曾国藩、李鸿章是这样，袁世凯、段祺瑞是这样，独夫民贼蒋介石更是这样。蒋介石彻底卖身投靠帝国主义，变本加厉地推行儒家的反动路线，使我国陷入了苦难的深渊。国民经济萧条，人民生活极端贫困，科学技术更处于奄奄一息的悲惨境地。

三、凭借政治权势，摧残和扼杀科学技术

儒家大肆叫嚷“法先王”，鼓吹“天不变，道亦不变”，强迫人们事事遵从古制，不得越雷池一步。孔老二甚至连个酒杯的式样改一下，也大发雷霆：“杯子不象个杯子，这还叫什么杯子！这还叫什么杯子！”（“觚不觚，觚哉！觚哉！”《论语·颜渊》）对突破儒家框框的科

学技术新发明、新创造,他们更是恨之入骨,凭借政治权势,施行种种手段,进行摧残扼杀。

我国宋代杰出的科学家沈括,积极参加了王安石变法,在科学技术上有许多发明创造。在历法上,他主张抛弃前人旧说,以节气定月,不管月亮朔望,完全去掉闰月,彻底实行“阳历”。同当时通行的历法相比,沈括的新历法是比较科学的,比较适合农业生产的需要的。但由于儒家的激烈反对,这一新历法一直没有得到采用。直到清朝,孔孟之徒阮元在《畴人传》中,还大骂沈括的新历法“与羲和制闰之旧,显相违戾,不合经义”¹⁾。

我国古代许多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哲学家和科学家,都对“天圆地方,天动地静”的说法提出过怀疑。早在战国时期,楚国大诗人屈原就曾经这样大胆地质问:“星星还在天上的时候,太阳又在哪儿躲藏?”“九州究竟安放在什么上面?”唐代法家柳宗元,在《天对》这篇重要著作中,进一步发展了我国古代的“地动说”。他认为,不是太阳有升起和落下,而是大地在不断的运动中,大地运动时对着太阳的一面是白天,背着太阳的一面则是黑夜。在儒家思想的统治下,这些宝贵的探讨被认为是“异端邪说”,没有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十八世纪,哥白尼的“日心地动”学说传到了中国,儒家们纷纷跳出来反对,阮元气急败坏地攻击说:这是“上下易位,动静倒置”,“离经叛道,不可为训”。两个表演日心地动说的仪器干脆被乾隆皇帝打进了冷宫。到十九世纪中叶,顽固的守旧派吕吴调阳还死抱着儒家经典,要求天文学要“本之大《易》”。在科学发展的滚滚洪流面前,发出绝望的哀鸣:“天道之不明,圣教其将绝矣。”

儒家惯使贼喊捉贼、倒打一耙的伎俩。他们口口声声攻击秦始皇“焚书坑儒”,“毁灭了文化”。事实上,儒家才是真正毁灭文化、毁灭科学技术的罪魁祸首。秦始皇焚书,并没有焚掉农业、医学等科学书籍。据《汉书·艺文志》记载,秦代医学书籍共有四百九十卷。而到了写《后汉书》的时候,只剩下《内经》三十六卷了。张衡的《算罔论》,祖冲之的《缀术》、《九章算术注》,祖暅的《天文录》、《天文录经要诀》等许多著名的科技著作,后来也相继失传。许多著名科学家,生前备受迫害,死后也不得列入正史。许多重要的科学技术发明得不到推广、应用。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更是大量被埋没。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活字印刷术,是十一世纪中叶宋朝的一个“布衣”(老百姓)毕升发明的。但是,这样一个重大的发明,在当时却没有受到重视,更没有得到推广。直到元代,才又有了木活字的出现。六百年后的清代,曾铸了一批铜活字,存在武英殿中,也被保管者大肆盗卖。乾隆初年,借口铸钱缺铜,干脆就把这批活字熔毁。关于毕升这位大发明家的生平,正史上毫无记载。究竟是谁“毁灭文化”、“毁灭科学技术”,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在破坏科学技术发展方面,儒家甚至采取了赤裸裸的镇压手段。春秋末期,奴隶暴动和封建私有经济的出现,严重地动摇了奴隶制的经济基础。面对这种情况,奴隶制度的卫道者孟轲疯狂地叫嚣,要对开垦荒地、发展生产的人判罪,咬牙切齿地说:“故善战者服上刑,……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孟子·离娄上》)儒家把生产工具的改革视为洪水猛兽,恨得要死,怕得要命。经典《礼记》中色厉内荏地说:“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²⁾在历史上,象这样反对改革的事例是有据可查的。

1) 羲和是传说中远古时代主管天文历法的官。

2) 郑玄的注把鲁班作为该杀的例子。儒家仇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到了何等地步。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势不可挡。尽管儒家千方百计地妄图阻止科学技术进步，但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仍然创造了祖国古代光辉灿烂的科学文化，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在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中，起着最积极作用的，正是那些出身卑微、但却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劳动人民，他们才是科学技术的真正主人。而那些自命高贵的孔孟之徒，却不过是这些发明创造的掠夺者、享有者和摧残者。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科学摆脱资产阶级的桎梏”(列宁：《在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社会主义制度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伟大领袖毛主席为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建国二十五年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光辉指引下，广大工农兵和科技工作者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智慧、才能和创造性，打破美帝、苏修的封锁，使我国科学技术事业有了空前的发展，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支援世界革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党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十分尖锐复杂的。刘少奇、林彪一伙完全继承了孔孟的衣钵，竭力推行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是妨碍科学技术发展的最大祸害。因此，科学技术要发展，要前进，就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断地同刘少奇、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斗，同守旧、倒退的儒家反动思想斗。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勇于实践，大胆创新，努力发展科学技术，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